

# 论陶渊明《咏二疏》诗的思想意义

——兼论“知足”的是与非

(日) 井上一之<sup>1</sup> 著 李寅生<sup>2</sup> 译

(1 中央学院大学 日本东京; 2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)

**摘要:** 陶渊明《咏二疏》吟咏的是西汉宣帝时以“知足”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广、疏受叔侄二人。该诗不仅涉及到陶渊明的思想,也涉及到了六朝时代的“咏史诗”及致仕的一些问题。

**关键词:** 陶渊明 《咏二疏》 思想

**中图分类号:** I 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4580(2012)01-0001-(06)

陶渊明《咏二疏》吟咏的是西汉宣帝时以“知足”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广、疏受叔侄二人。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,虽有种种不同说法,但关于其中的内容,除了彰显致仕、歌咏归乡等看法之外,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了。本文以陶渊明的创作意图为中心,认为该诗不仅涉及到陶渊明的思想,也涉及到了六朝时代的“咏史诗”及致仕的一些问题。

## 一

先看一下《咏二疏》诗的原文。内容以汲古阁旧藏本为底本<sup>[1]</sup>,文字上的异同则参照了相应的陶集诸本:

1 大象转四时, 2 功成者自去。3 借问衰(底本注:一作商)周来, 4 几人得其趣? 5 游目汉廷中, 6 二疏复此举。7 高啸还旧居, 8 长揖储君傅。9 钱送倾皇朝, 10 华轩盈道路。11 离别情所悲, 12 余荣何足顾。13 事胜感行人, 14 贤哉岂常誉。15 厌厌闾里欢, 16 所营非近(底本注:一作正。陶诗析义、张自烈评本、陶诗汇注作所) 务。17 促席延故老, 18 挥觞道平素。19 问金终寄心, 20 清言晓未悟; 21 放意乐余年, 22 遑恤身后虑。23 谁云其人亡, 24 久而道弥著。

全诗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开头的六句,为作者对西汉二疏实现“功成者自去”

之目标的积极评价。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(第7句至第14句),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。以送别二疏为题的“祖饯·祖道”一类的诗,自古以来便享有很高的声誉。但是,第三部分开头八句(第15句至第22句)笔锋一转,描写了二疏回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,以及他们不屑于“近务”(身边的琐事),每日邀请亲朋故友在一起饮宴的情景。第19、20句的“问金终寄心,清言晓未悟”之语,从句子的结构来看有些不好理解,大概是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。在最后的两句中,以二疏所奉行的“道”经过时间的洗礼仍然闪耀着光辉而作结。

本文所要研究的,亦即是最后一句的“道”具体指什么?一般说来,“咏史诗”不只是叙述历史事实,还应该包括作者独特的评价。如此这首诗中陶渊明的独创性表现在哪里?而在对二疏的各种评价中,这首诗又有什么独特价值?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了本诗的素材,确认其与史实相对应的关系也应该是必要的。

## 二

关于二疏的传记资料,现存最早、最完备的当属班固的《汉书》。其中《疏广传》记载有如下内容:

广谓受曰:“吾闻‘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’,‘功遂身退,天之道’也。今仕官至二千石,宦成名立,如此不去,惧有

后悔。岂如父子相随出关，归老故乡，以寿命终，不亦善乎？”受叩头曰：“从大人议。”即日父子俱移病。满三月赐告，广遂称笃，上疏乞骸骨。上以其年笃老，皆许之，加赐黄金二十斤。皇太子赠以五十斤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，供张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辆，辞决而去。及道路观者皆曰：“贤哉！二大夫。”或叹息为之下泣。广既归乡里，日令家供具设酒食，请族人故旧宾客，与相娱乐。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，趣卖以供具。居岁余，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：“子孙冀及君时颇立产业基，今日饮食费且尽，宜从丈人所，劝说君买田宅。”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。广曰：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？顾自有旧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，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，但教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，众人之怨也；吾既亡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又此金者，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，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飧其赐，以尽吾余日，不亦可乎！”于是族人悦服。皆以寿终。（《汉书》卷七十一《疏广传》第四十一）

陶渊明的《咏二疏》虽然增加了作者的想象（第11、12、15句），但基本上还是忠实地沿袭了《汉书·疏广传》记载的内容，陶诗和上述引文中划线的部分可以一一对应起来。

虽然如此，但这首诗还是有一个小的地方与史书记载不同，还是需要注意的，这便是第22句的“遑恤身后虑”。正如注释书最后所指出的那样，这一句的出处来自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”郑玄对此做的笺是：“我身尚不能自容，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遑恤我后”即“不考虑自己死后子孙的后事。”根据本诗“遑恤身后虑”之意，他的说法更为具体，与死后完全不管子孙后事的情况相比，确实有更加具体的意思了。

按照这个观点，这一句便与历史事实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了。为什么呢？《汉书》记载的是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？”而其后又有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”二疏对子孙的深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。他们为子孙考虑得很深远，而不是一点都不关心。

这首诗是否还有其它的创作根据呢？其中的

可能性也不能否定。然而，关于二疏的相关材料在汉代之后几乎都是限于《汉书》记载（亦即二疏其它传记中扩大宣传的可能性较低）。在陶渊明写作其它作品时，所参考的也只有《汉书》了。陶渊明所作并且流传下来的《集圣贤群辅录》上（《陶渊明集》卷九）中的二疏条内容，即典出《汉书》。如果从整体来判断的话，陶渊明应该是在阅读了《汉书·疏广传》之后才写的这首诗。

这个推测的正确性，有写在此诗之前而为人所知的西晋张协的《咏史诗》（《文选》卷二十一）为证：

昔在西京时，朝野多欢娱。蔼蔼东都门，群公祖二疏。朱轩曜金城，供帐临长衢。达人知止足，遗荣忽如无。抽簪解朝衣，散发归海隅。行人为陨涕，贤哉此丈夫！挥金乐当年，岁暮不留储。顾谓四座宾，多财为累愚。清风激万代，名与天壤俱。咄此蝉冕客，君绅宜见书。

整首诗都以《汉书》的记载为依据，描写的是“念子孙”的二疏。这是与陶渊明《咏二疏》相同题材的较早作品，而且后来被《文选》选录。与张协的诗相比，陶渊明的诗具有强烈的意识似乎是自然的事。事实上，在唐代之前，“咏史诗”的题材和主题都是固定化的，其创作与前代作品相比，突出了竞争性较强的一面（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咏史诗现存23首）。

从内容上看，这首诗虽以《汉书》的基本资料为“咏史”依据，却与事实上的记载有些出入，这样的改动似乎也能让人理解。在陶渊明看来，他还是依照张协咏史传统而创作此诗的。可是，咏史诗应当遵循“基于史实，叙述自己的评价”的创作原则，如果根据史实做一些比较自由的发挥，还能称为“咏史诗”吗？陶渊明为什么要增加一些修正的史实？增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从“念子孙”的二疏到“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”的二疏，诗中改变了的人物形象又体现了什么意义呢？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下研究。

### 三

笔者以为，陶渊明对二疏传记的修改，是受到了东晋时对二疏评价观点的影响。疏广、疏受叔侄留名青史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显赫的功绩，而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他们的行为较多，这些行为大多数获得了赞誉，得到了较为肯定的评价：

例如西晋羊祜《与从弟书》：

吾以布衣，忝荷重任，每以尸素为愧。大命

既隆，唯江南未夷。此人臣之责，是以不量所能，毕力吴会。当凭朝廷之威，赖士大夫之谋，以全克之举，除万世之患。年已朽老，既定边事。当有角巾东路，还归乡里，于坟墓侧为容棺之墟。假日还息，思与后生味道。此吾之至愿也。以凡才而居重位，何能不惧盈满以受责邪？疏广是吾师也。圣主明恕，当不夺微志尔。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六）

又如西晋·华谭《上笺求退》：

谭闻霸主远听，以求才为务。僚属量身，以审己为分。故疏广告老，汉宣不违其志；干木偃息，文侯就式其庐。谭无古人之贤，窃有怀远之慕。自登清显，出入二载，执笔无赞事之功，拾遗无补阙之绩；过在纳言，暗于举善；狂寇未宾，复乏谋策。年向七十，志力日衰，素餐无劳，实宜辞退。谨奉还所假左丞相军谿祭酒版。（《晋书》卷五十二《华谭传》）

又如东晋·王彪之《五言诗序》：

余自求致仕，诏累不听。因扇上有二疏画，作诗一首，以述其意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五〇）

梁·沈约《致仕表》：

徒以桑榆无几，时制行及，不朝之礼，忽在今辰。使反身敝庐，待终穷巷。臣又闻之，悬车散发，其来旧矣。昔广德请骸，义在量力。二疏知止，惧贻后悔。数年以来，稍就尽竭，气力衰耗，不自支持。（《艺文类聚》卷十八）

如上所示，在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中，言及二疏的内容几乎都是致仕和知足、知止方面的，并没有谈到他们的政治业绩。如上述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段所指出的那样，当时申请致仕的人是把二疏作为一个典型来称引的，也就是说言及二疏就要言及致仕，言及致仕就要言及二疏。

那么，为什么致仕就要言及二疏呢？即使是在汉代，除了二疏之外还有很多的政治家、官僚不仅退休，而且他们致仕还有比二疏更为引人关注的理由。或许，这是因为二疏在汉代属于功德圆满的最早退休的人物。第四段中提到的薛广德等人，有的是代皇帝承担失政之责而退休的，有的是因身体老病而致仕的。说到致仕的理由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，只是想辞职而已（底本《陶渊明集》之《集圣贤群辅录》记载“时广六十七”）。二疏的致仕不仅得到了允许，还被

赐金七十斤。朝廷官员为他们举行了送别宴会，这是属于一种特例了。

上面列举的史实，都是南北朝时期特有的事情。翻阅当时的史书可以看出，即使是在南朝想要致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类似的事例经常可以看到。当时的门阀贵族把官职分为清浊两类，他们不喜欢繁忙的工作，甚至不少人希望解职或致仕。和寒门士族不同的是，他们拥有大规模的庄园，不依靠俸禄仍然可以过着优越的生活，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。但是，对于处于脆弱权力基础的南朝皇帝而言，无论是为了维持个人的权力，还是为了笼络人心，门阀贵族希望人才能够留在朝廷，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。而且劝慰那些想要致仕的人，也体现了朝廷对贵族的信赖和关爱<sup>[2]</sup>。拒绝希望致仕之臣下的君主，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倒错的情况。第二段中的华谭（255—322），也曾提出致仕的想法，但结果却是“不听”。正如第三段中所记，王彪之（305—377）在提出致仕的请求后，也曾经多次被拒绝。如果从他们的遭遇来看，二疏圆满致仕美谈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二疏本人，而是准许二人同时退休的汉宣帝，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。第二段中的“疏广告老，汉宣不违其志”，叙述的正是这件事。

从这些例子来看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二疏被频繁的提及，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，其浓厚的色彩也就容易理解了。致仕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些困难，所以二疏的美谈才有了自身的价值，于是引起了人们的瞩目。对于二疏来说，与对他们人格的仰慕、崇拜相比，当时的人们感情或许对他们的境遇更为憧憬、羡慕。这种说法有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。

但是，也有对二疏的行为持批评立场的人。兴宁（363—365）初年，前燕的慕容恪、慕容评两位由于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原因，被追究责任，他们因此提出了辞职。当时的国君慕容暉在挽留二人时，说了如下内容：

朕以不天，早倾乾覆，先帝所托，唯在二公。二公懿亲硕德，勳高鲁、卫，翼赞王室，辅导朕躬，宣慈惠和，坐而待旦，虔诚夕惕，美亦至矣。故能外扫群凶，内清九土，四海晏如，政和时洽。虽宗庙社稷之灵，抑亦二公之力也。今关右有未宾之氏，江、吴有遗烬之虏，方赖谋猷，混宁六合，岂宜虚己谦冲，以违委任之重。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复袞之大。（《晋书》卷一百一十一《慕容

嗥传》

这里所说的“割二疏独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复袞之大”两句，便是对恪、评所说“臣虽不敏，窃闻君子之言，敢忘虞丘避贤之美，辄循两疏知止之分”的应答之词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做到“知止、知足”，才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像二疏那样的辞职、隐退，只不过是“独善”而已。从儒家以“经世济民”为第一要务的立场来看，二疏是当然要受到批判的。

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《汉书·疏广传》的作者班固的言论。在《疏广传》的“赞”中，他写了如下的内容：

赞曰：隽不疑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，终始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免辱殆之累，亦其次也。（《汉书》卷七十一）

隽不疑是汉昭帝时的人，他为人严谨正直，兢兢业业，在担任青州刺史、京兆尹职务之后，因病辞职。始元五年（前82），有一位自称是戾（卫）太子刘据的人出现在都城，由于真假难辨，遂引起了人们的困惑。只有不疑认为：无论是否是戾太子都是罪人，于是便把他逮捕起来，直接关进了监狱。后来发现这是占卜者成方遂的诈骗行为，由于对成方遂进行了恰当的处置，隽不疑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。《二疏传》的“赞”中所说的“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”，即是指此事。

在这里，班固认为与隽不疑相比，“免辱殆之累”的疏广还是差一个等级的人物。确实是如此，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态能够保持冷静，并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置，与担心发生不测之事而产生逃避的想法相比，哪一种更为积极，无论是谁大概都能明白的。虽然是说“知足”，但实际的情况是，经常这样说的是一种深谋远虑。如果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话，应该是对朝廷管理危机而出现的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。出现管理危机的话，就要保全自己，这只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在中国古代，隐遁者的数量是很多的，他们或是为了实现正义，或是为了获得自由，或是为了等待机遇。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，他们选择隐遁作为了一种手段。只是二疏的隐遁=致仕，获得了一种自由的结果，而这除了“免辱殆”之外，应该说并不是他当初的目的。

至此，陶渊明的意图逐渐也就清楚了。这便是从历来对二疏生存方式的消极评价，转而直接对班固的解释提出异议。

正如上所见，《汉书·疏广传》记载了“早

期隐退”和“散财宴乐”（另外还有一件事是：太子外祖父欲使其弟监护太子，二疏认为是外戚而反对）的两件事。前者是“如此不去，惧有后悔”，是担心遭遇不测而采取回避的态度；后者是“不欲益其过而生怨”。对于疏氏一族而言，与亲情相比，这是更具有深谋远虑的行为。这两件事在班固的意识中，应该是“对未来的危机管理”为主题而写的。

但是，保留对二疏持否定的班固的评价，是原来的史料所载。而对二疏事迹进行的再评价，则是对两件相关的事情、特别是对后者做什么样的解释，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。张协认为“挥金乐当年，岁暮不留储。……清风激万代，名与天壤俱。”“贵”（社会地位、名誉）不算什么，“富”（财产）也不值得留恋，创作出高洁的二疏隐者形象，才是作者所要提示的内容。相对而言，在提出不同的价值观（后述）的同时，“不顾子孙将来”，即没有把朝廷的危机看成是重要之事，则是陶渊明强调的二疏形象。“挥金”行为的本身，就是不给子孙留下财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既是为子孙考虑，也是为自己考虑。两种解释具有它的两面性。

即使是对“散财宴乐”的故事进行再解释，前面的“早期隐退”故事在理论的整合方面也是有它的破绽的。事实上，《咏二疏》诗只是陶渊明一个修改过的故事，开头两句便是这方面的说明。

二疏并不是迫于压力突然隐退的，他们隐退的根据据《汉书》记载是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和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”。在这两个原因之外，还有《老子》（第四十九章·九）的“持盈”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。

对于这个观点，陶渊明用“大象转四时，功成者自去”两句诗重新进行了解释。笔者认为，这两句似乎出自《韩氏易传》。

又引《韩氏易传》言：

五帝观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。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。若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。（《汉书》卷七十七《盖宽饶传》）

从这一条来看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陶渊明的观点从《老子》转到了《易》，由消极“持盈”的“处事训”，升华到了积极的“退让”道德方面上了。亦即二疏的命运如同季节变化一样，不只是处于高位，也有谦让于后辈之意。诗中的“得其趣”，似乎即是指这一点。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改正，但陶渊明的再解释却是一个大的价值观

转换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陶渊明在《咏二疏》诗中对史实做一些修正，进而对二疏做再评价便也成了必然，这样也就容易使人理解了。相当于前面张协诗中描写的“达人知知足，遗荣忽如无”、具有高洁人生的“达人”，陶渊明是从人生的“退让”之路来解读二疏的。

#### 四

最后所要谈到的问题，是陶渊明要写这首诗的动机。陶渊明为什么要选取二疏为题材呢？二疏与陶渊明在隐退归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，而不同的是二疏是官至三太（太傅）之类的高官，而陶渊明则是仕途受挫自己辞官的。在两者产生共鸣的同时，他们所处的境遇还是有些差异的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笔者认为大致的区别有三个方面。

A，在二疏的“知足、知止”同感中，陶渊明找到了人生之“趣”。其观点如下：

“趣”字最宜领会。功成而不归去，不得趣者也。古今得其趣者，会有几人？惟二疏知足、知止，所以得趣。惟其得趣，所以散金置酒，不以多财遗子孙也。（清·温汝能《陶诗汇评》卷四）

B，批判了那些虽然有功但却不能退隐的人。观点如下：

本诗歌颂二疏功遂身退，从侧面抨击了功成夺国者。（孙鈞锡《陶渊明集校注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）

C，对二疏的“挥金”之举产生了共鸣。观点如下：

先生托慕二疏，在不留金，以为得处贫之道。（丁福保《陶渊明诗笺注》所引程穆衡《陶诗程传》）

在这三种观点中，最为稳妥的说法应该是C了。如按A说，陶渊明回避了与张协不同的“知足、知止”之语，而且“挥金”一词也与“知足”无关。如按B说，与强调致仕、隐退的二疏相比，其他人如范蠡、张良似乎是更为合适。不是范蠡和张良而是二疏，正是由于“挥金”的原因。

陶渊明对这类“挥金”的行为是非常关心的，在他的诗歌经常谈到此事。如：

虽无挥金事，浊酒聊可恃。（《饮酒》其十九）

倾家时作乐，竟此岁月驶。有子不留金，何用身后置。（《杂诗》其六）

这里类似陶渊明对“挥金”的理解，除了包含人生的哲理之外而没有其它的含义。再看一个例子，“作乐”（《杂诗》其六）的意义也有“让今天充实”的特点。这虽然成为了一个大前提，是人生的一次性和有限性决定的。

得欢当作乐，斗酒聚比邻。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（《杂诗》其一）

从古皆有没，念之心中焦。（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）

一生复能几，倏如流电惊。鼎鼎百年内，持此欲何成。（《饮酒》其三）

人生不过百年，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，逝去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“今”便显得非常重要了。虽然为了将来而准备的“金”，但人如果去世之后“金”也就没有用了。《咏二疏》诗中的“放意乐余年”，所说的意思便是如此。

当然，比“挥金”更为重要的意义还有一点，就是“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和家人”，“放意乐余年”就是这个意思。陶渊明担心儿子们的将来而写的《责子》诗，虽然是谐谑之作，但代表作《形影神》有如下的内容：

适见在世中，奄去靡归期。奚觉无一人，亲识（一作戚）岂相思。但余平生物，举目情凄洏。（《形影神·形赠影》）
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哪一个人是独立生存的，他不能不想到他的家族和亲戚。几度出仕和归隐的陶渊明，最后的回归之处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族之中。但是，个人孤独的生存、孤独的去世，如果能够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孤独的话，那么对家族（子孙）的结局也就不得不必须要考虑一下了。看到这种情况时，为了自己人生的快乐，也就懂得“挥金”积极的价值了。前面《杂诗》其六的“有子不留金，何用身后置”，便是对子孙的一种暗示，是在《汉书》二疏评论的基础上，修改了“挥金”的含义。

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，致仕者虽然很多，陶渊明为什么会选择二疏的为例，其中的理由也就容易理解了。致仕之后，二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只是每日以“挥金”为乐事。这不是为了朝廷（国家）、官场（组织）和家族，而是为了自己的余生能够得到快乐，陶渊明从这些人的生活中悟出了其中的“道”。正如程穆衡所述，陶渊明即使在贫困的生活中，也感受到了“挥金”的重要性。（下转第11页）

二元对立,没有在坚持“理想主义”时一定要一味地“抗俗”,没有将超越与世俗看作是形同水火,势不两立;而这正是他的智慧与力量所在。他以最现实而理想的姿态“就在现实中”抵达了理想的乌托邦彼岸,实现了“高尚而又高妙”的存在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王蒙.老子的帮助[M].北京:三联书店,2009.15.
- [2]章培恒、骆玉明.中国文学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6.363.
- [3]范应元撰、黄曙辉点校.老子道德真经古本集注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.135.
- [4]袁行霈、杨贺松编校.陶渊明集附:和陶诗六种[M]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(新世纪万有文库),1997.88.
- [5]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.陶渊明资料汇编(下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

1962.360.

- [6]刘安编、张双棣校释.淮南子校释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9.16.
- [7]张岂之主编.中国历史(秦汉魏晋南北朝卷)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1.46.
- [8]任继愈.老子绎读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6.7.
- [9]陈鼓应.老子今注今译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8.23.
- [10]刘再复.人文十三步[M].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0.40.
- [11]林贤治.纸上的声音[M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.7.
- [12]河上公、王卞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.21.
- [13]蒋锡昌.老子校诂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37.464.
- [14]余秋雨.千年一叹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2.498.

(责任编辑 吴国富)

#### (上接第5页)

##### 结束语

以上是围绕着陶渊明《咏二疏》诗“遑恤身后虑”展开的几个问题的讨论。主要的观点可归纳如下:

羊祜《与从弟书》中与主题无关的“早期隐退”和“挥金宴乐”内容,在原著者班固的意识中,属于“危机管理”的方面。华谭《上笺求退》取材于《汉书》的《咏二疏》诗,对诗人而言是把二疏特别是他们的“知足”之事作为一个实例,对班固的某些否定性评价做了重新的认识。张协从“高洁的隐者”的角度,陶渊明从“懂得进退之礼”的角度,来重新解读二疏的价值。王彪之《五言诗》的直接动机,是针对二疏的“挥金”之事而言的。陶渊明对此的解释是“不为自己的家族,而是为了个人的余生之乐”,认为这首诗具有人生之“道”的意义。

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之时,正是以王谢为代表

的门阀贵族引以为豪的时代,社会的统治基础是家族本位的制度。荣辱不仅是个人的事,也是一个家族的事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在被称为“个人主义”时,陶渊明才与当时的社会有了不同的想象。他的《咏二疏》诗中的“遑恤身后虑”之句,无疑包含着家族主义思想,给同时代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观念,乃至于是一种冲击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陶渊明.陶渊明集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.
- [2]参见沈星棣、沈凤舞.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[M].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2.

(责任编辑 吴国富)